

日常生活中的城乡、阶层和性别*

——家政女工身份认同与意义构建

陈震 邝献文 刘希**

摘要:家政工群体怎样理解自己的劳动经验和日常生活、如何界定自己的职业和社会身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本研究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借助交叉性和批判性话语分析等视角,研究家政工群体对自身劳动经验的讲述以及其中建构出来的阶层、城乡和性别身份的变迁,检视家政女工在工作生活中如何制造和协商意义、进行文化生产。研究发现,结构性和交叉性的社会差异和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家政女工身份认同的“新自由主义化”。但家政女工也在能动性地消解甚至反抗此类不平等,如超越市场和商品逻辑对自身劳动的社会价值赋值,还有在家庭内部对性别不平等的协商,等等。

关键词:城乡 阶层 性别 身份认同 意义构建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方向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家政服务业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而不断发展,家政服务人员的职业环境、生存境遇和身份认同也发生着持续的变化。西

* 本文系西交利物浦大学教学发展基金“通过跨学科研究提高对研究生的研究导向型教学”(项目批准号:TDF20/21-R21-1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陈震(troy.chen@city.ac.uk),诺丁汉大学博士,伦敦大学城市学院传媒、文化与创意产业系副教授;邝献文(xianwen.kuang@xjtlu.edu.cn),南丹麦大学博士,西交利物浦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媒体与传播学系副教授;刘希(通讯作者,xi.liu@xjtlu.edu.cn),香港大学博士,西交利物浦大学人文社科学院中国研究系副教授。

方经济体从制造业到服务业转型的经验启发我们,国内未来服务业尤其家政服务将是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缺口,在老龄化社会和计划生育改革之后更显得尤为迫切。有学者提出,中国“2015后发展议程把承认和支持照料经济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妇女峰会上提出的四点建议,对把照料经济引入公共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董晓媛,2015:8—9)。

目前国内外已经有大量关于当代中国家政工的研究,由于学科和分析视角的差异,相应的分析和批判重心也有不同。首先,大量关于劳动关系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揭示了家政工作在社会宏观和公共支持系统上面临的结构性不平等,以及在微观权力领域即家庭内部呈现的复杂的权力互动关系。其次,大量研究都揭示了家政工所从事的家务和照顾劳动的经济意义,以及作为重要的社会再生产劳动的巨大社会和文化价值。在社会特别是大众媒体中,对家政女工社会身份建构和形象塑造在整体上呈现出片面化和贬低化的特点。而家政工群体怎样理解自己的劳动经验和日常生活、如何界定自己的职业和社会身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注重阶层差异并强调经济因素的主导作用,市场化制度合理化了社会化大生产后的细致社会分工。同时,在市场化 and 消费主义背景下,靠自己的勤劳和聪明才智赢得美好生活的的话语被大众所普遍接受。从事家政服务行业的人员在悄然发生变化,在具有流动性、季节性特征的大批进城务工农村妇女身旁,也多了不少学历高和经验丰富的竞争者。这一现象在互联网新经济的背景下尤为明显,家政行业的组织和盈利模式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新互联网经济的技术框架和组合之影响。在监视泛滥的后资本主义(Zuboff,2019)语境中,我们发现市场上既有本地、老牌家政服务公司,也出现了基于互联网公司面向不同城市服务的众包平台。有学者发现,平台经济下,在“劳动力—资本—消费者”的三方框架中,家政工的劳动控制与抵抗策略更加复杂了(程枫,2019)。在当代中国“照料危机”、城市家庭状况持续变化以及平台经济(包括新的家政服务平台)崛起和数字媒体大量应用的背景下,家政服务市场中的从业者如何看待自己的职业身份,如何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制造和感知意义,并在这些行为上有何新的发展变化?换言之,家政工有没有对自身主体性和能动

性做出自反性思考?

农村流动妇女和城市基层妇女是家政业劳动力市场的主力,这与社会再生产劳动和照顾工作的性别化密切相关。对照顾工作的贬低,通常与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文化紧密地连接在一起(England & Folbre, 1999)。妇女会更容易地被纳入情感和利他性所激发的照料工作之中,这是现存性别制度中的社会等级和社会化过程的后果之一(Ferber & Nelson, 1993)。本文主要研究家政女工,俗称“保姆”或“阿姨”的日常生活和身份认同。同时,基于对来自城乡不同背景的家政工比较,我们发现其阶层分野十分明显,流动方向较为单一。家政女工面临着多元、复杂的社会差异和不平等问题,如城乡、地域、阶层、性别、职业、年龄、媒介素养等(Chen, Z. & Chen, L. 2021; Chen, Tian & Chang, 2021; Pei, 2021; Pei & Chib, 2021)。有学者认为,妇女的再生产劳动一方面对维系资本主义运作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又被支配资本主义的异化关系所统摄,这种资本主义逻辑之外的经济空间中的独特位置,为她们提供了独特的立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发展出反对资本主义的主体性(Hartsock, 1983)。那么,在家政业这种被市场化和商品化的再生产劳动中,家政女工的身份认同有何复杂和矛盾之处? 交换、商品化及其异化(例如情感劳动),对家政女工主体性建构有何影响?

在当下对基层和流动妇女的主体认同研究中,学者们注重多重社会结构,特别是市场转型后城乡二元体制、工厂制度(雇佣关系)、族群和传统性别意识形态等对流动妇女主体建构的影响,如看到国家、资本和社会的合力下,新生代打工妹的社会身份建构同时涉及生产和消费领域(余晓敏、潘毅,2008),也有看到结构与主体一直处于一个不断作用和反作用的过程(许怡、辛荣,2021:23)。有学者提醒我们,流动妇女主体性是复杂的,既有认同资本和父权制的消极性主体,亦有批判二者的混合性主体和生成性主体;在资源上,消极性主体和混合性主体都缺乏社会支持网络来挑战和改变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而生成性主体则能建构出不同的社会支持网络,从而挑战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苏熠慧,2021:14)。因此,对流动妇女身份认同的研究需要看到过程的复杂性,也要努力发掘其能动性和反抗性。

有研究追溯家政工的身份认同和城市融入问题,试图在社会结构之下发现家政工能动的认同和策略等(杨书,2008:13—19;郭慧敏,2009:16—

21;苏熠慧,2011:178—205;王娟泰,2012;Sun, 2014)。在目前关于家政工主体性特征及其建构过程的研究中,很多学者发现阶层和性别作为关键变量构成了中国家政工身份认同的重要影响因素,进而研究了这些因素及其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家政工人主体性建构的。如有研究认为,雇主与劳工在家庭场域互动的延伸,是公共领域不可消解的性别秩序与阶层冲突,既养又育的工作特性使家政工成为“阈限人”,暂时缓和了阶层矛盾,但其“家里外人”身份的生成并不意味着她们可以消弭“底层女性”的污名(周群英,2019:9)。有学者从情感劳动的角度研究过家政工在身份认同中面临的情感疏离和情感剥削问题。他们认为,“虚拟家人”的市场需求让家政工人将家人情感进行了工具化的使用,这种情感剥削阻碍了雇主与家政工建立和发展出超越市场交换关系的更为长期、平等、互惠的社会关系的可能性。家政工为了避免身心被分割,有时采取“跳槽”、讨价还价、搭建“前后台”等方式来夺回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但也可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主动放弃控制权(苏熠慧,2011:178—205;苏熠慧、倪安妮,2016:8;刘育婷、肖索未,2020:15)。也有学者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析框架来考察“雇主—家政工”关系中家政工主体性的生产和塑造,认为双方有着丰富的互动关系,并特别指出,家政工的积极性和主体性使两者之间的“情感平衡型”关系得到发展。

以上这些对家政工人身份认同和主体建构的研究,都看到了社会结构和主体之间复杂的关系,并用不同的分析框架来对“雇主—家政工”关系和家政工人主体模式进行分类,很多研究也都是在家务劳动市场化的背景下展开的。但是集中关注家政工身份认同与市场交换以及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把地域、城乡、阶层和性别等分析范畴综合起来进行相关考察的研究并不足够。市场化和城市化等带来的社会不平等恰恰是通过地域、阶层和性别等方面表达出来的。我们认为,交叉性是一个有效的研究视角,可以帮助我们考察家政工群体对自身劳动经验的讲述以及其中建构出来的阶层、城乡和性别身份的变迁,检视家政工在工作与生活中如何制造和协商意义、进行文化生产,特别是追溯他们有没有可能建构出超越市场交换关系的身份认同和主体性。

基于以上这些研究现状,我们继续关注当下家政女工在日常工作和生

活场景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微观权力关系,考察这些权力关系如何在家政女工职业和社会身份认同中体现出来;同时探讨家政女工如何应对这些不平等关系并为自己的工作和付出赋予价值和意义,以及有没有在市场和商品逻辑之外发展出不一样的身份认同。在当前照料市场化和推动家政服务提质扩容的政策背景下,运用交叉性分析视角探讨中国家政工人的身份认同与意义构建,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因为家政工人在有偿的社会再生产结构中所处的独特位置,运用当下实证材料检验家政工人能否生产出具有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性,不仅能够深化相关理论,还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从转型期到经济发展新常态过程中的社会结构变迁。

二、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首先对于“身份认同”的界定,本研究采纳后结构主义视角,认为“身份”并非自然化的,而是建构在大量的区别和差异的基础上的。并没有基于生物或者内在本质的真实或者真正的身份,身份认同从来都存在于不同的权力关系和知识形式中,是话语和实践的一种建构。“身份是被重塑的人格类型,是组合和交流方式的凝结,是带有某些惩罚和特权的社会地位,是将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的方式,是在世界中定位自己的方式,也是确认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做法和关系的方式。”(McWhorter, 1995: 85)

“交叉性”这个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黑人女性主义运动和学术研究的概念,后来成为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研究乃至社会运动等领域的重要女性主义术语,用于解释社会构建的多样性的多样性,以及理解在种族、性别、性、阶级、能力等方面对人类生活的组织。只要物质条件与人的身份认同和行动有某种关系,交叉性对重新认识身份认同的影响就会有重要作用,帮助我们探讨结构性权力关系以及这些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建构的互动。

关于交叉性这个分析范畴和方法论究竟会让我们更好地研究个体身份认同,还是会让我们忽视宏观社会结构的问题,有很多的争论。本文在

此采用女性主义学者瓦莱丽·史密斯(V. Smith)的看法,即交叉性最有用的不是阐明任何群体的错综复杂的主体性,而是暴露权力关系的动态运作。“通过解决种族、性别、阶级和性的意识形态相互强化的多种方式,交叉性阅读可以照亮产生统治和从属关系的各种方式。”(Smith, 1998)同时:

要避免那些永恒的、透明的或没有问题的身份认同概念,而选择那些,用斯图尔特-霍尔的话说,“永远不完整,永远在过程中,永远在代表内部而不是外部构成的身份认同”,同时需要“承认那些以斗争和抵抗体制暴力和剥削的名义,以特定具体方式争取种族、性别、性和阶级身份的战略需要”。(Smith, 1998)

同时,本研究借鉴社会学家莱斯利·麦考尔(L. McCall)的观点,即交叉性的方法要关注“类别间的复杂性”(inter-categorical complexity),“关注分析类别内和跨分析类别的多个社会群体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而不是单一社会群体、单一类别或两者内部的复杂性”(McCall, 2005: 1771-1800),也关注不同类别之间的互动和相互构成的关系。在社会科学中,交叉性可以促进“对同一事实的不同解释”,因为它既包含又规定了“多种社会动态的重叠”(the overlap of multiple social dynamics):

这些不同的解释及其规范意义,是交叉性的逻辑结果,它始于有色人种妇女对性别和种族不平等的主流描述的批判,以及她们在学术、身份、结构和社会活动等多个载体之间产生的新知识。(Clarke & McCall, 2013)

最后,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交叉性方法论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综合之处(Ferguson, 2016; Bohrer, 2018; Mojab & Carpenter, 2019)。20世纪末出现的交叉性概念曾批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不注意各种社会类别的复杂动态,而交叉性女权主义试图通过一个坚持社会的复杂、动态性质的框架来捕捉主体性和社会立场的多层次、矛盾性,以超越仅仅对性别/阶级关系的关注。但同时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也反思了交叉性对阶级讨论

和资本主义批判的不足之处,特别是如何处理资本主义整体和其不同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我们可以结合交叉性方法论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将种族、性别、阶级、性、能力和民族等看作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特定语境中形成的关系,以把握复杂多样的社会现实。

目前已经有学者讨论交叉性概念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苏熠慧,2016:218—241;杜平,2017:106—115;吴小英,2018:21—32;张也,2018:83—95;肖索未、简逸伦,2020:12—27)。张也指出,“在中国的语境中使用交叉性概念必须将其情境化和去殖民化,而一种开放的交叉性概念有助于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张也,2018:83—95)。苏熠慧建议:

一是更多的研究者从性别、阶层和城乡等多个层面关注底层女性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经验,二是借用“交叉性”流派的方法将她们集体而非个体的声音发出来。在交叉性流派中,由“支配矩阵”和“压迫轴线”等基础概念发展而来的系统性分析通常会结合“情景化的立场”,即柯林斯所强调的群体在不平等权力关系中形成的共同地位和和历史中共同遭受的不平等经历来分析群体的遭遇,同时思考改变群体命运的可能性。这在中国语境中,对许多被忽视的边缘群体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苏熠慧,2016:218—241)

在中国社会再生产劳动的市场化过程中,包括了阶层、性别以及城乡和地域等的“差异”和“分化”尤其值得关注,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梳理在社会再生产劳动市场化下家务劳动的社会组织方式及历史变迁。肖索未和简逸伦认为,交叉性可以帮我们提出一系列关于照料经济的研究问题,如:

在照料的社会组织及其历史变迁中,处于不同社会位置(阶层、城乡、地域等)的女性和男性以何种方式被卷入,对他们个人及其家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的照料体制如何在性别、阶级和城乡结构的交织关系之上形成和流变,又对后者的动态变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也可以考察关于照料的未来想象,比如,家政服务的雇佣双方是否能够以及如何建立起超越市场关系的有意义的社会关系?这样的社

会关系将如何影响现有的城乡和阶层关系？我们能否以及如何建立起超越（至少减少）性别和阶层不平等的照料体系？（肖索未、简逸伦，2020：12—27）

以上这些理论启发我们在研究当代女家政工职业身份构建和认同时，要着重了解这一群体是工作和生活在社会再生产劳动的市场化和商品化的大背景下的。为此，我们通过运用交叉性分析视角，考察中国情境下的城乡、阶层和性别如何作用于家政工人的主体性构建，并提出以下主要研究问题：

第一，在交叉性社会不平等的背景下，家政女工对城乡、阶层和性别差异有着怎样的认识并如何在对自身经验的讲述中表达出来？不同社会位置的女工是否有不同的身份认同？

第二，在具体日常工作中，家政女工是如何运用不同策略去顺从、消解、反抗这些交叉性的差异和不平等，进而构建其职业、社会身份认同及意义的？她们是偏向更加市场化的身份认同，还是更加社会化的身份认同？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主要是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形式，由于我们的调查项目旨在做出实证和批判性的贡献，我们注重发掘和检视受访者的具身生活经验和自反性言说与叙事。从2019年11月至2021年10月，我们共参与观察了12位家政工，并对其中10位进行了后续深度访谈。我们的访谈分别在我们生活和工作过的城市，包括大连、上海、苏州、宁波和广州进行，而我们访谈的阿姨则来自大连及北三市农村、安徽、苏北、广西等地。我们主要通过熟人社会网络以及购买家政公司平台服务两种渠道进入田野。在大连、宁波和广州筛选的样本主要来自熟人介绍，而在上海和苏州选取的样本则兼有两种方式的介入。无论是哪种渠道，我们都以城乡不同背景作为主要筛选标准，力求寻找不同背景的具有代表性的样本。

介绍阿姨的熟人主要包括曾经聘用过阿姨，或者本身未聘用过但认识从事家政工作的阿姨的亲友。在对部分阿姨进行完访谈后，我们在后续的熟人介绍要求中，会特别询问亲友是否认识另外某些特定背景的阿姨，以尽量满足多样化和具有代表性的样本的需求。

而在购买家政公司平台服务介入这种渠道上,由于服务平台的派单具有一定的随机性,我们也尽量利用平台上可允许的选取条件,比如“雇主更喜欢的烹饪方式和饮食口味”等,以期获得来自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观察和访谈样本。通过家政服务平台联系受访者,使研究者同时具有雇主身份,进而影响家政工对身份认同的表述。我们在收集和分析数据的过程中也会对此注意和反思,如努力降低访问者的权威,做到较为平等的沟通,在受访者谈及雇主满意度时深入讨论,了解家政阿姨的相关动机和策略。

对所有潜在的样本,我们都在表明我们的研究者身份和征得阿姨同意的情况下,对其工作进行观察,并约定在其有偿服务时间内,完成一个大约 1 小时的深度访谈。在对阿姨的工作进行观察时,我们会特别留意她们和服务家庭人员的互动,以及她们在某些具体工作中特别关注的地方和向雇主提出的问题,并在不影响她们工作的情况下进行及时的询问。而对她们的访谈中,我们重点通过观察所关注的点,请阿姨进行进一步的阐释,并通过一系列的回顾性问题,了解阿姨们的过往生活和工作经历、故事以及对相关问题的认知和感悟。由于访谈涉及相关家庭情况问题,出于对受访者的保护,我们对所有阿姨做匿名处理,仅以代码加以区别显示。

简而言之,我们搜集的数据包括参与式观察的田野笔记和深度访谈的采访稿。由于质性研究方法采集的数据庞杂,我们主要采用主题分析法,以揭示出我们研究调查的重点面向,并用田野笔记和受访人原话还原的方式来佐证我们的论点。在进行主题分析时,我们对田野笔记和深度访谈采访稿进行了多轮次的开放性编码。在得到了较为全面的编码后,我们对原始编码进行比对和合并,最终得出不同的主题。

三、 研究发现和讨论

(一) 家政女工身份认同中的城乡和阶层差异

家政女工对交叉性的社会差异和不平等(如城乡、阶层、性别、职业、年

龄差异等)的认知,是她们建构职业、社会身份认同及创造工作和日常生活意义的基础。在家乡和城市两个时空中流动的家政工对城乡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城乡家庭内部生活的差异和分化的认知会较为深刻。

我们的分析显示,首先,家政女工对城乡差异的认知主要体现在工作机会(包括家政工作的机会)这一重要主题的讲述上面。从北方来江苏做家政的L阿姨说:“其实对于南方来说,家政工作的工资也不算高,但是北方和南方比较的话,南方是比北方高。”^①另外一位家政工G阿姨认为回老家后无法找到收入满意的工作,她说:“老家发展肯定还是落后了,县城里面跟市里面就没法比。”^②从苏北来到苏南打工的J阿姨则一直从事家政业,她中间曾经回去老家待了两年,但发现“钱不好挣”,只好又回到苏南。虽然老家的环境“一点都不差,但就是工资低”,她认为家政业的工作机会多寡可以明显反映地域发展的差异:“假如我要回去,家政在我们那边做不起来的。那边不是一、二线城市,而是三、四、五线城市,人家消费不起家政服务的,他们没有这么多钱。”^③H阿姨曾结束一线城市里的住家保姆工作回到家乡小县城,后来因为无法找到收入满意的工作,只好再次回到广州做住家保姆。尽管家里的两个儿子仍然年幼,但为了能够尽快攒够支付先前在县城里买的毛坯房的装修款,她再次离开因疾病困扰而不得不在家乡休养的丈夫及两个孩子。

其次,家政工人们眼中的城乡差异还体现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特别是家政业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对家政职业的评价的不同这一点上。来自东北某地区的L阿姨认为在苏南介绍自己的职业没有问题,但如果回到老家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做家政我现在不觉得不好意思,但是如果回去说我会觉得不好意思。”^④同样来自东北的Y阿姨也强烈地感觉到了家乡的亲友们对家政职业的抵触:“他们当然不喜欢我做这种工作,都说伺候人的工作不好做,但没有办法。”^⑤相比于来自外地的家政工,苏南本地M阿姨

① 访谈6,L家政工,2021年10月3日。

② 访谈3,G家政工,2021年8月5日。

③ 访谈5,J家政工,2021年9月7日。

④ 访谈6,L家政工,2021年10月3日。

⑤ 访谈9,Y家政工,2021年10月3日。

对家政工作接受度更高,认为行业歧视不太严重,即使有歧视,对她也不是问题。可以看出,地域特别是城乡差异是阿姨们进行地域流动的重要原因,而职业认同颇受经济收入水平的影响。她们普遍认为在经济较好的地方,家政就业机会更多,收入更高,所受的职业歧视也更少,也有相对更高的职业认同。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从业者在情境化的社会文化圈层中,仍是半遮蔽的信息分享状态。我们因此可以看出,目前市场化的照料体制从经济不发达地区吸收了大量劳动力,是建立在地域不均衡发展特别是城乡二元对立基础上的,而家政阿姨们却往往以这种地域差异去合理化自己的流动和职业选择。

在话语之间,家政工们承认并强调城乡差异,阶层差异则鲜被提及。但是用经济相关标准或者职业来衡量和比较的描述则比比皆是,表达出对阶层差异的间接认识。G阿姨非常羡慕很多年轻的雇主,她说:“能在苏州买起房子买起车,我都觉得他们家这条件都挺好的,有的时候也觉得人家这挺年轻的,就能买房又买车的。”^①S阿姨在讲述她和老太太雇主及其小女儿之间的互动时,也常常提到她和雇主家庭在吃穿用度上的差异:“人家是人上人,能雇得起保姆的离休老干部。人家都是知识分子家庭,但是知识分子家庭对待人都特别苛刻。”对于这些经济和阶层差异,很多受访者用学历和素质来给予解释。如G阿姨就认为,初中学历现在就是文盲,后悔没有继续读书。M阿姨也认为,由于学历不足很多工作都找不到。而L阿姨认为她做的大部分客户家庭“素质”就是高,所以她认为家政从业人员:“素质要提高,你不能提高,一方面你员工素质不行,客户也不认可。”^②J阿姨则认为老家和苏州“表面上都差不多,不过在人文方面,人与人之间交流思想很不一样,回家有一点不适应”。素质,在这里被阿姨们当作一种具有规训力量的标准,在与雇主家庭的比较中,去反思自己的学历、谈吐、与家庭成员间的相处模式(严海蓉,2001:18—26;Anagnost,2004;Murphy,2004;Kipnis,2007;Jacka,2009;Sigley,2009;Sun,2009)。她们对这些语言的挪用,说明改革开放后合理化城乡和阶层差异的社会话语对她们产生

① 访谈3,G家政工,2021年8月5日。

② 访谈6,L家政工,2021年10月3日。

了巨大影响。阶层差异和分化是市场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后果之一,目前市场化的照料体制也建立在阶层不平等的基础上。但很多家政阿姨将阶层差异看作目前人们之间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差距的原因,将学历和素质的话语和意识形态内化到自身的主体认同之中,潜在地接受了这种社会不平等。

(二) 家政女工身份认同中的性别差异

在这一部分,我们主要从社会性别角度分析家政女工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以进一步阐释家政女工的身份构建和认同问题。我们对多数受访者的访谈内容的分析显示,家政女工们仍受流动的父权和流动的母职制约,这在之前关于打工妹和家政工的研究中已经被发现(金一虹,2010:151—165;孙雅璐,2019;肖索未、汤超萍,2021:66—83;Fu, Su & Ni, 2018)。这意味着,大部分家政女工的家庭里依然是丈夫做主,再生产劳动和亲子陪伴则主要由母亲承担。

我们观察和访谈的阿姨们,绝大部分都认为母职才是她们人生的第一要职。在母职和工作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她们会认为或被认为应该放弃工作,或选择能使其更好地履行母职的工作,如非住家的家政工作。G阿姨的子女放在老家由自己的父母带,她认为两年后在女儿读初中的时候她要选择回去陪伴孩子。虽然为此要放弃现在的工作,但她觉得不得不如此:

过两天上初中了,她现读五年级,在老家。到时候我陪她的时间要多了,要陪读。上初中的女孩子父母一定要管着,要有父母盯着……但是孩子肯定是要跟着她走,以后她们要上学了,肯定要跟着她走的。^①

J阿姨的两个儿子都在自己身边,她平时尽量抽出时间陪伴孩子,也坚

^① 访谈3,G家政工,2021年8月5日。

持每周休息一天,把时间留给孩子。她决定在小儿子高考之前陪他回老家读书备考,放弃目前的家政工作:

为了小孩子我还是想回老家,在这边我感觉还不行,考不上,或者考不了什么好的大学。我看我们那边学校的质量就挺好的,读书要求严。要将来考大学的话还是要回去的,上到高中考大学的,还是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去考的。^①

Y阿姨和Z阿姨都选择在儿女初中升高中的阶段辞去了先前在工厂的工作。之前在工厂里做质检工作的Y阿姨表示:“一直以来都是儿子为重,工作为辅。放弃了工厂的工作可惜,但也是没办法。看管孩子方面老公只是辅助,最多也就每周回来一次。”^②多年以来,Y阿姨的丈夫要么在浙江工作,要么在苏州工作,但即使是在离家仅50公里左右的吴江区工作,他也只是一周回来一次。照顾和看管儿子的职责从来只能落到Y阿姨的身上。在儿子青春反叛期,只有当觉得自己再也无法独自承受因管教而导致的母子关系紧张的时候,Y阿姨才想到召唤丈夫回来一次。自从之前工作的工厂搬到离家一个多小时车程以外的地方以后,Y阿姨觉得再也无法在工作和照顾儿子之间取得平衡了,只能换成工作时间更自由的家政工作:

初中升高中很关键,我不会时时盯着儿子的学习,但有个人在身边看着,问一下,总是比没人管好很多的。没人在家的时候,你无法知道他是不是每晚都在玩手机。这手机你给他又担心他总是在玩,不给也不行,那样你连人都找不到。^③

H阿姨在广州带着雇主儿子的时候,无时不想到自己那个不比眼前照

① 访谈5,J家政工,2021年9月7日。

② 访谈9,Y家政工,2021年10月3日。

③ 访谈9,Y家政工,2021年10月3日。

料的小男孩大多少的小儿子,心里对两个小孩在成长和生活上的比较是难免的。雇主儿子那以标准速度增长的身高和体重,也无时不提醒着自己儿子在乡下“喜欢时多吃一口,不喜欢时不吃也没人管”^①而长得特别瘦小的无奈。然而对于儿女留守在家乡的女家政工,履行母职的唯一可能就是回乡工作。在偿还完大部分债务后,H阿姨最终回到位于广西某小县城的家乡开起了收入远比起做住家保姆时低的小卖部,以更好地照顾两个童年的儿子。小卖部在两个儿子读书的小学附近,中午放学后,两个孩子还可以到她的店里吃饭,顾客少的时候她还可以督促一下他们的课后作业。即使到了晚上,辅导孩子功课的责任仍然落在H阿姨一人身上。因为工伤而只能做零散工作的丈夫,常常因为不管儿子们的作业而受到H阿姨在其微信朋友圈的公开指责。

和Y阿姨一样之前在工厂工作,但孩子父亲一直缺席的单亲母亲Z阿姨,也在女儿初中考高中的关键时段辞去了电子工厂车间主任的工作。我们的受访者,无论有没有丈夫,以及丈夫在或不在身边,她们在家庭中,特别是育儿中的地位,似乎没有太大的不同。在她们眼里,母职如果不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无法逃离的责任。男人的缺席如果不被公开指责,好像也变成了理所应当的无奈。这说明了不平等的性别分工和“天然/自然化”了的母职意识形态依然在这些流动的基层女性中产生持续影响,是她们个人身份认同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男人的缺席,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市场化话语构建中,养家糊口的重担“自然地”落到了妇女身上,“进城打工”从“贴补家用”演变到“经济支柱”。这种话语遮蔽了城乡经济不平衡加剧、农村流动和失业人口增加的实际困难,反而将这种困难带来的压力转嫁到家庭和个人身上。这和西方新自由主义论调如出一辙,即将贫困和就业压力诉诸个人和市场竞争,扁平化处理 and 忽视结构性不平等。可以说,不平等的性别意识形态包含了被自然化的性别分工,这既是她们去选择家政行业的原因,也是离开家政行业去照顾个体家庭的原因。无论是做还是不做,很多家政阿姨都承担着工作和育儿/家务双重再生产劳动的负担,这是她们身份认同中很难规避的性别经验。

^① 访谈4,H家政工,2021年9月6日。

(三) 交叉性视角下家政女工的意义构建

基于以上家政女工对城乡和阶层差异,以及其在家庭内部地位即性别差异的认识的分析,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家政女工如何看待自己的职业和社会身份,并如何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感知和制造意义,而这些又与市场化机制有何复杂的关系的问题。我们的分析显示,在具体日常工作中,家政女工运用了不同策略去顺从、消解或抵抗这些交缠的社会差异和不平等,进而积极构建其身份认同及意义。

1. 家政女工如何看待其职业身份

对于为什么选择家政作为其职业的问题,多数受访者表示,影响其选择该职业的主要原因是家政工作本身可为她们带来比其他可选职业更高的收入。尽管在她们眼里,这是一份相比其他职业来说社会地位较低和职业成长空间较窄的工作,但其不算高的工作强度和较高的收入仍然对她们有较大的吸引力。

G阿姨在苏州从事家政工作之前,先后在北京、南京和苏州做过很多其他工作,包括工厂工人和餐饮业服务员等。但她最终发现在劳动时间、强度和回报的比较上,大城市里的家政服务工作最令她感到满意。她说:“我以前在饭店,最多就只能拿到5000块钱,还得加很多班,而且还是饭店生意好时才有奖金什么的。现在做家政能拿到6000多块钱,而且每周可以休息一天。”^①在某家政平台工作的L阿姨可以通过放弃休息多接单增加收入,她说:“收入肯定咱们希望再高点更好,但是目前来说还算可以。”^②受访者中不乏放弃在工厂的工作到城市里从事家政行业的阿姨,因为除住家保姆外的家政工作,相比工厂流水线工作来说更轻松灵活,工资较高,有时还可以兼顾自己家庭里的照顾工作。M阿姨家曾经在苏州开过小纺织厂,因为出口行业不景气关闭了工厂开始做家政。她说:“像我们这样的年纪都是做家政的多,厂里面管得比较死,说实话做家政还比较自由一点。做工

① 访谈3,G家政工,2021年8月5日。

② 访谈6,L家政工,2021年10月3日。

厂要天天加班,现在做家政不用再加班了。”^①Z阿姨表示:“我们公司现在到工厂里招人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②另一位受访者J阿姨说道:

家政做惯后,她们一般不会再进厂的。现在做家政的,我感觉就是像我这个年龄的,再小一点的就去发广告。^③

即使如此,把家政当作过渡工作,期望进城赚钱后回老家从事其他职业的阿姨并不少,也有不少体验过其他工作后回流到家政行业的。一位东北的家政工S阿姨曾经带领着自己村子的母女俩进城做保姆。起初,这对母女对进城“伺候”别人非常抵触。后来她们发现比起在工地做小工,家政服务已经算很轻松的了:

小工一天也就150块钱。洗碗连50块钱都挣不上。我们几个女的在工地也不容易,睡觉、洗澡也不方便……两个礼拜之后,家政有活儿了,二话不说就去干。轻快啊,不累。做个饭,洗个衣服,收拾家,这不家常便饭么?在家还得喂猪喂牛,下地干活儿。哪一样儿能比男的少了!^④

由于受访的阿姨来自不同阶层和年龄段,她们对家政工的普遍认识还是工作强度可以接受,甚至比较“轻快”。这在出身农村的阿姨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因为在农村她们在做家务和照料工作之余,同样从事重体力劳动。一旦城市里出现比家政工作更轻松,又不会和母职产生冲突的工作,她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转行。比如,在广州从事了两年左右家政工作的F阿姨,在本项目开始前,其工作已换成了某医院临时工。虽然收入比不上家政工作,但据其描述,医院的工作内容更为愉快和轻松,主要为内部会议准备茶水资料,以及其他后勤支持工作。

① 访谈7,M家政工,2020年12月13日。

② 访谈9,Y家政工,2021年10月3日。

③ 访谈5,J家政工,2021年9月7日。

④ 访谈8,S家政工,2020年12月14日。

然而,我们的受访者中也有少数对家政职业认同感较高的。前文提到的单亲母亲Z阿姨在女儿初中升高中的关键时候,辞去了工厂车间主任的工作,转而从事朝九晚七、中午休息三小时的家政工作,以给女儿的学生生活提供更好的支持:

早上班12点结束,可以回家做饭,下午班3点开始,再回家已经晚上8点。女儿一般白天都在学校,所以一般中午都是做好了她晚上的饭菜,放冰箱里等她放学回家自己热了吃。^①

即使这样,对Z阿姨来说,这样的支持对女儿来说已经是经常加班的工厂工作不能实现的了。另外一个让Z阿姨较认同家政职业的原因是,目前她工作的公司为员工提供了人人皆有可能的上升空间。对于一线工作的优秀员工,公司将把她们派往厦门总部接受培训,培训结业回来的员工将晋升为内部培训师。然而,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样的职业跃升机会,已经脱离了家政工作而转向了教育培训。某种程度上说,Z阿姨的职业认同并不来源于家政工作本身,而是未来可期待的跃升机会。此前Z阿姨曾在目前的公司成功提升为培训师,但出于对更高薪资的追求,跳到了另一家复制了目前公司机制的企业,亦从一线家政工作跃升至培训师,最后因为新公司的管理问题,Z阿姨重回目前公司,按照政策也必须从一线家政工作做起。两次成功晋升的她,对未来的再次职业跃升充满了希望。“我们的老板也是从一线做起的。只有从一线做起的员工,以后晋升后才能更能体会和理解一线员工的工作。”^②

实际上,多数家政工人对于一线工作的主要内容,即保洁工作的认同度极低,因为保洁需要处理不少脏的地方。而同时,这项工作被认为是任何人通过简单培训都能做好的,其他工作如做饭和育儿及照料等则不同。

我们的研究发现,导致家政职业认同较低的一个原因是行业内要求的“雇主/客户至上”服务理念。在这一要求下,家政工需要不断调整自身去

① 访谈10,Z家政工,2021年10月4日。

② 访谈10,Z家政工,2021年10月4日。

适应雇主不同家庭的服务要求。如L阿姨曾经说她所在公司制定了各种“家法”,让家政服务人员尽最大可能让“客户满意”,但是做饭口味众口难调,对卫生的要求也不一样,甚至家政工对客户的贴心建议也会让客户不舒服,所以家政服务员很容易被投诉:

我们也有教育,也有培训课。必须要强调客户满意,客户夸才行……你要经过培训的,思想政治都得教育的,对不对?你得品德够才能上岗。反正公司对这方面应该还行,我们公司还有公司“家法”,我们要触犯“家法”,被开除的都有。^①

在不同家庭服务过程中,不同雇主的要求也不一,有的特别挑剔。在保洁上,有的雇主对洁净度要求非常高。G阿姨服务过的一位雇主甚至每次都要光脚踩在地上检查地板是否打扫干净。L阿姨觉得家政工作中做饭“也不太是问题”,但:

最关键的是各人家的口味。针对各个客户的口味……所以我们喜欢固定客户。固定了就知道你这家的口味,也不用天天去问他今天假如炒个西红柿鸡蛋是咸点、淡点,或者红烧肉是颜色重点还是轻点。^②

L阿姨还在访谈里谈到自己的同事:

有个家政服务员就是被客人投诉了。客户家爱吃外卖,那天吃的外卖味道很大,他就说:“阿姨你把我的外卖给收一下。”阿姨就说:“吃外卖对身体不太好,我们可以给你做饭。”这个客户不高兴了,意思你说我这吃的 unhealthy,他还不舒服,他觉得阿姨过分了,你不应该管。^③

① 访谈6,L家政工,2021年10月3日。

② 访谈6,L家政工,2021年10月3日。

③ 访谈6,L家政工,2021年10月3日。

客户至上在Y阿姨眼里就是无条件接受顾客提出的“只要是不太过分”的要求。即使遇到客户的无礼,她也要求自己忍着。“客户怎么说就怎么做吧,要是和人家干上了,那就说什么也是自己错。”Y阿姨刚做家政不久就遇到某个客户的无礼对待,她表示当天完成工作后一出雇主家门眼泪就“飙”了。每每遇到这样的状况,满心的委屈在生活中得不到释放的时候,就只能一个人走到旷野“大喊出气来减压”^①。

导致家政职业认同度较低的另一个原因是,工人们在雇主家做完照顾、家务劳动,回到自己家里仍要从事这些劳动,两个空间都延续了性别分工,双重的再生产劳动带来身心负担。J阿姨觉得自己做完保洁并没有成就感,因为“不是我自己的家,假如我自己弄我的家就有成就感,这样没有成就感”。她每天回家后需要继续做自己家的家务劳动:“家里面要全部把它整理好我才能休息,包括第二天炒的饭,早上烧什么饭,然后吃的时候,我都要把它弄好。快11点了我才能睡觉。”^②在上海做保洁钟点工的C阿姨曾表示,每天要跑好几家“重复在家里做的事”^③,这让她感到疲惫又无意义。家政工职业认同度低,不仅源于家庭和工作中双重再生产劳动带来的身心负担,也因为再生产劳动价值的不被承认强化了家政工作中的无意义感。“再生产劳动体量巨大、意义深远,是一项需要劳动者做出理智判断、情绪调动和身体投入的多元复杂劳动,却难以外化、测量和复制。在现代工业社会的价值导向下,再生产劳动的时空特性往往难以得到承认和尊重,容易被另一种劳动的时空逻辑所贬低、侵占和挤压。”(李洁,2021:32)

我们发现,在家政业这种被市场化和商品化的再生产劳动中,家政女工无法避免用交换价值来建构自身的职业认同。特别是在地域、城乡、阶层和性别上处于劣势的女性,更容易成为流动社会群体并从事家政工作。而地域、城乡、阶层和性别差异又往往成为她们合理化自己职业选择的原因:因为家乡不够发达,家庭经济收入不高,学历低,“素质不够高”,是女性,更应该也更容易照顾家庭,所以选择家政行业。即使有些家政女工在

① 访谈9,Y家政工,2021年10月3日。

② 访谈5,J家政工,2021年9月7日。

③ 访谈1,C家政工,2019年6月18日。

工作中得到的成就感不高,但她们还是接受了这种市场机制对她们的召唤和选择,以及性别、阶级和城乡结构的交织的差异。

2. 家政女工如何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感知和制造意义

即使如此,我们的受访者中也不乏积极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感知和制造意义的表现。我们的观察和受访对象很多来自农村,她们任劳任怨并且跟同村同龄人比受过一定的教育。无论是在广州工作的F阿姨和H阿姨,还是在苏州工作的J阿姨、L阿姨和Z阿姨,她们对于自己在工作中的能力和表现,以及个人对于生活安排的组织能力和沟通表达能力,都非常自信,做起活计也特别能得心应手。

(1) 独立

家政工作的收入让很多家政女工经济上得到了独立,在家庭中有了发言权,对家庭内的不平等权力关系有了对抗的基础。即使很多家政女工继续承担了自己家庭内的再生产劳动,继续面对“流动的父权和母职”,她们还是认为这份工作“让自己找到了价值”。苏州本地M阿姨会用市场交换价值为自己的工作赋值,以对抗对家政工作的歧视。她的儿子一开始不让她做家政工作,怕被人家“看不起”,而M阿姨对他说:“你妈是去客户家干活,也不是干别的,人家要是看不起我,我再换一家做呗。他们付了钱,我就去服务,如果他嫌我做得不好,那就不用我就行了,我也换一家。”^①她还会借此肯定自己付出的家务劳动的价值:“我在家里不是也搞卫生吗?不是也要做饭吗?我出去做不也是一样的吗?”她称自己出门做家政为“上班”,在下大雨的时候她会让儿子开车接送她“上班”和“下班”。^②家政工作让M阿姨找到自身的价值感,在家庭中也享有更平等的地位和关系。G阿姨和丈夫每月要给老家县城的房子和现在买的车子还贷,她觉得自己的工资能帮助一起还贷,对此非常满意。虽然每次工作完回到家里还是要继续做饭,但是她在很多事情上可以跟丈夫共同商议做决定。J阿姨在生活上从来不用老公的钱,都是用自己赚的钱。她直言:

① 访谈7,M家政工,2020年12月13日。

② 访谈7,M家政工,2020年12月13日。

在家里面我没有地位,我现在又不花他的钱,我把头发都剪了。他的想法同我的想法不一样,他认为他就是一家之主,他说了算,可是他有些东西看得太近了。两人想法不一样,他有一种“我不知道我不会我不懂”的感觉。你不会你不懂你还想当家?还想说了算……我这几年醒悟了,我几个老乡都买了房子,他不让买,他不懂,他这个脑子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但是他又想当家又想什么的。我同你讲的就是农村的大男子主义,他就是属于那一种知道吧?^①

她认为:“把家庭弄好,特别是把孩子弄好就行了,我就不管丈夫,我从来不叫他的名字,就是‘那个人’。他非常生气,‘那个人是谁’,他没姓名,我叫他就是‘那个人’。”^②虽然J阿姨对性别不平等持续协商和反抗,但她也某种程度上将社会性别的不平等即父权制下的男女不平等归因于城乡差异,并认为城市家庭的素质高于农村家庭,甚至寄希望于由农村到城市的流动解决类似不平等。

(2) 沟通和“人情”

家政工作需要相关职业和沟通技能,很多时候也需要情感付出。提升个人沟通技能被一些阿姨所看重,也认为她们的情感付出和劳动有价值 and 意义。L阿姨在来苏州做家政工之前,已经在老家做了十多年的酒店业,她说:“我刚干服务行业的时候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不善于沟通,但干了服务行业得去跟人交流。”在因收入下滑转行做家政的时候,虽然磨合了一段时间,但总体上困难不大:“主要是沟通明白了就没啥事,也有客户不满意的,下次调整就是,对吧?”她强调了工作中的情感投入和付出:“要用心去做,虽然是雇佣和被雇佣,但是心要达到一致。比如说人家不在家,你就应该把这个家当成自己的家,最起码你得用心去。”^③

J阿姨则如此讲述与客户的沟通:

① 访谈5,J家政工,2021年9月7日。

② 访谈5,J家政工,2021年9月7日。

③ 访谈6,L家政工,2021年10月3日。

做得挺好的,我们没有什么矛盾。我这个人要有什么不懂的、不会的,我会问,或者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来,道个歉就是……我要想做得好,就一定要用心去做。还有好多方面都要注意,沟通等都是很重要的。^①

在客户有时要求她承担保洁工作范围之外的照顾老人和孩子的活儿时,她会体谅客户的需求并答应,觉得这是一种“人情”。M阿姨认为在工作中可以“将心比心”,雇主对她好,她也会更投入地工作。“你对我好,我肯定对你也很好,如果客户刁难我们,说实话我们干活也没什么心情。”^②但是只要一上来先问清楚了客户的要求,工作起来就方便很多。

很多家政女工认为她们的工作很有价值,可以让客户满意和认可。G阿姨对客户的满意很高兴,她说:

我下午的客户就说:“我现在感觉不用阿姨我都不习惯了。”我这一次回家一个星期,回来后帮她家弄一下。她讲:“我发现你来弄,我家里干净多了,我感觉现在不能不请阿姨了。”^③

L阿姨就说:“工资不算非常高,我们今年也调了一下工资,但是总而言之我们待遇哪怕再高点也是物有所值。”因为她对个人服务质量要求很高:“隔一天去一次的,有的人就稍微弄一下。但是我不行,我就觉得弄不干净心里过不去,所以的确很辛苦。”在客户对她服务满意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的个人价值得到了实现:

有时候也真的很高兴啊,我给客户的床单换完了,她就说“我的家变得好舒服呀”,反正感觉特高兴,特舒服,也有荣誉感。^④

① 访谈5,J家政工,2021年9月7日。

② 访谈7,M家政工,2020年12月13日。

③ 访谈3,G家政工,2021年8月5日。

④ 访谈6,L家政工,2021年10月3日。

(3) 社会资本和文化生产

家政行业比较特殊,可以接触到不同阶层的家庭,特别是中上阶层的家庭。有的家政工认为可以借机扩展眼界,获取新的信息。可以说,这是她们增加社会和文化资本的一个途径。Z阿姨表示其在苏州工作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雇主家庭,大多数都是素质较高和友好的,他们的人生经历和生活分享拓宽了自己的见识。“今天上午我服务的也是一个在上海的语文老师,说话给人特别正能量的那种,特别能感染我。”^①Y阿姨也谈到了家政工作使她能够从客户身上学会如何更好地生活,如何与人打交道,怎样教育孩子以及怎么对待老人。“我的一个客户养花养得特别好,我也跟她学,后来我在自己家里也养了好看的花……只要你想学,什么都能学得到。”^②

J阿姨谈及自己受到雇主家庭影响,早就想在城市里买房,而卖菜的丈夫则没有远见,阻止她,因此错过机会:

没有知识是很可怕的,环境真的很重要……我们真的受客户的影响,还是要有本事的……我现在不用老公的钱,我也不想要他的钱,我也可以赚钱……叫客户满意开心嘛,我也很开心。我受他们的影响,我想他们这样也可以,将来我也可以,不会差的。^③

L阿姨、J阿姨和G阿姨都在工作过程中观察雇主家庭对孩子的教育观念和方式,并会在自己的育儿或亲子关系中予以借鉴或者避免。前两位阿姨发现雇主家庭中很多成员,包括祖父母都参与了孩子的陪伴和教育,非常认同并愿意效仿。G阿姨在服务中发现,雇主家庭中有的过于宠爱孩子或者施以暴力,她认为这两者都不可取,说自己对孩子“不能太惯,也不能太散养”^④。J阿姨和G阿姨受到雇主家庭的影响,都决定一两年后回到老家陪孩子一起读书。上海的C阿姨通过熟悉的家政雇主帮女儿辅导功课,报考重点初中时帮忙写了推荐信,最后女儿考上重点高中并顺利升读

① 访谈10,Z家政工,2021年10月4日。

② 访谈9,Y家政工,2021年10月3日。

③ 访谈5,J家政工,2021年9月7日。

④ 访谈3,G家政工,2021年8月5日。

大学。

从以上三点发现可以看出,市场机制里的交换价值是家政女工建构自身主体性的主要标准,较满意的收入让她们经济独立,有的家政阿姨用市场公平等价交换的话语来对抗家政工所面临的社会歧视。大部分家政女工将家政行业作为家庭生计的来源和谋生手段,相对较少的人将它作为实现自我发展的职业。但很多家政女工认为,家政行业可以帮助提升她们的沟通能力,有机会提升个体家庭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也有家政女工试图在市场机制之外寻求价值实现和身份认同,比如她们会付出额外的“人情”帮助雇主家庭,会认为自己的服务价值带来了很大的“荣誉感”,这些话语往往是试图超越市场和商品逻辑对自身劳动的社会价值的赋值。另外,面对流动的父权和母职,很多家政女工对经济独立的重视显示出她们开始在家庭内协商性别不平等的机会。但总体上来说,相比于社会化的身份认同,我们所研究的家政女工们总体上更偏向更加市场化的身份认同。

四、结论

本文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聚焦中国当代在城市中工作,在农村老家和工作地点定期往返的家政女工,试图通过她们自己的话语言说自己的生命经验。通过交叉性的视角和分析框架,本文关注这些家政从业人员在城乡、阶层、社会性别交叉的差异和分化下,对其有着怎样的认识,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感知和制造意义。对于交叉性视角下的不平等,女家政工的策略不一,由于城乡、阶层、社会性别、教育水平、媒介素养等方面的差异,她们的感知和归因过程也不尽相同。在具体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们试图从三个方面主题式地展现她们日常生活的重点,即她们如何看待城乡和阶层差异,如何定义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即性别差异,如何建构自身的职业和社会身份。我们的分析表明,家政女工对于交叉性的社会不平等有着比较清晰的体认,在自己的口述中对于地域和城乡差异非常敏感。她们不会直接使用“阶级”或者“阶层”这类词语,却借用经济相关指标来表达这

种阶层差异。同时,她们又往往用学历和素质等标准和话语将这种巨大的分化合法化。由于大多数家政女工面对着持续的性别分工和流动的母职承担,她们往往对于社会性别差异和不公也有着清晰的认识。

几乎所有受访者在谈及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对家庭的贡献时,都会表达自己一直从事这些社会再生产劳动。这些认识影响到她们自己的身份认同:在目前的城乡和阶层差异下,从事家政主要是为了在学历有限的条件下提高经济收入,但如果母职要求与其冲突,则会首先考虑回归家庭或转行。在家政业这种市场化和商品化的再生产劳动中,家政女工无法避免用交换价值来建构自身的职业认同,市场是家政女工塑造自己主体性的主要标准。家政行业可以说就是建立在地域、城乡、阶层和性别的不平等上,并让这些方面处于劣势的女性更容易成为被动流动社会群体并从事家政工作。然而在她们的身份认同的表述中我们发现,地域、城乡、阶层和性别差异又往往成为她们合理化自己职业选择的原因,接受了这种市场机制对她们的选择。

大部分家政女工将家政行业作为家庭生计的来源和谋生手段,相对较少的人将它作为实现自我发展的职业。但很多家政女工认为家政行业可以提升她们的沟通能力,有机会提升个体家庭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在交叉性视角的启发下,我们发现性别与阶层、地域、城乡、年龄等不平等维度有着相互作用,可以帮助我们发掘具体情境中不同的压迫体系交织塑造个体微观经验的动态过程。很多家政阿姨最为在意的是城乡和地域差异造成了发展机会的不平等,认为通过提高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从乡村或小城市迁移到大城市,可以有很大机会减轻自身遭受的阶层和性别不平等。她们对性别分工特别是主要由女性来承担的社会再生产劳动虽有怨言,但最终接受。相比于性别不平等,她们大都认为经济收入和社会阶层的差异与自身更为相关。这些自反性叙述大多注重个人归因而忽视结构性不平等,呈现出明显的新自由主义化特征。

那么,在具体日常工作中,家政女工是如何运用不同策略去顺从、消解、反抗这些交叉性的差异和不平等,进而构建其职业身份及意义的?

首先,我们认为家政女工关于学历、素质、眼界、知识、环境的话语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这些差异和分化的顺从,将其合理化。自我素质、知识、

眼界等的“提升”观念和意识,转变成了对市场化之下家政工新的规训和规范(*discipline and normalisation*)的前提和手段。家政女工的文化生产是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下的产物,基于市场契约和母职劳动商品化,家政女工的职业得以定义,而她们不断确证自己的表现是否符合市场化标准,并在日常生活中加以操演和巩固。对“沟通”能力的重视使得这种市场逻辑不仅规定了什么是家政女工不能做的,也同时生产性地规定了她们应该去做什么、如何做、做到什么程度(如不能逾越“教育”客户的界限)。这种结构性和交叉性的不平等,是用雇佣关系和家政公司制定的“家法”——成文和不成文的契约——来进行文化生产得以延续的。对中产家庭生活方式(养花)、投资方式(买房)、养育和教育子女方式的关注和效仿,也显示出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生产。

其次,我们发现家政女工也在能动性消解甚至反抗此类不平等。虽然雇主满意是她们工作的主要目标,但有的家政工的口述反映出她们认为其从事的社会再生产劳动有经济之外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试图在市场机制之外寻求自我实现和身份认同。另外,面对流动的父权和母职,很多家政女工对经济独立的重视显示出她们开始有在家庭内协商性别不平等的机会。可以说,社会流动性也可以为一定程度的反抗提供基础。因为在空间上,流动女工所依赖的雇佣家庭或平台,同时也是职场和社交空间。这个空间在市场化背景下变得复杂,给家政女工提供了以前职业不具备的外部性。比如,受访者M阿姨就在家庭内部沟通时,让家人正视家政作为体面“工作”(上下班)的存在,并提出要利用市场逻辑进行必要的反抗,即雇主看不起她们或做得不顺心就换工作。具体地说,它不仅通过生产与再生产劳动获得报酬并转化成经济支撑,也是社会化交往、情绪支持、视野拓展、观念转变等的生成性空间(Chen, Z. & Chen, L. 2021)。

因此,在家政业这种被市场化和商品化的再生产劳动中,家政女工的身份认同有很多复杂和矛盾之处。交换、商品化及其异化对家政女工主体性建构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总体上来说,相比于社会化的身份认同,我们所研究的家政女工总体上更偏向市场化雇佣安排制度下的身份认同。这种市场化的制度安排,参与构建了家政女工新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化身份认同,也给家庭内部反抗和协商提供了物质/非物质基础和生成性空间。可

以说,结构性和交叉性的社会差异和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家政女工身份认同的新自由主义化。但是,家政女工也积极应对这些不平等关系,为自己的工作赋予价值和意义,不断寻求协商不平等权力关系的机会。本研究对在家政工身份认同的构建过程中,性别与阶级、城乡、年龄等不平等维度之间是如何相互叠加和强化的做出一定探讨,但未对其他相关话题如家政工如何与农村女性、城市基层和流动女性、家政行业中其他性别从业者等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建立认同;同时,在家政工内部,不同年龄、收入、学历、户籍的家政工身份认同和意义建构有何差异、如何团结互动等,还需要开展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

参考文献

- 程枫,2019,《平台经济的劳动控制与抵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董晓媛,2015,《照料经济、性别平等与包容性增长——中国落实 2015 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思考》,《妇女研究论丛》第 6 期。
- 杜平,2017,《重申交叉性——男性特质的理论突破与研究启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 郭慧敏,2009,《家政女工的身份与团结权政治——一个家政工会女工群体的个案研究》,《妇女研究论丛》第 6 期。
- 金一虹,2010,《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第 4 期。
- 李洁,2021,《重新发现“再生产”——从劳动到社会理论》,《社会学研究》第 1 期。
- 刘育婷、肖索未,2020,《“干活时把雇主当家人,相处时把自己当外人”——住家家政工的雇主关系及情感劳动研究》,《妇女研究论丛》第 4 期。
- 苏熠慧,2011,《控制与抵抗——雇主与家政工在家务劳动过程中的博弈》,《社会》第 6 期。
- 苏熠慧,2016,《“交叉性”流派的观点、方法及其对中国性别社会学的启发》,

- 《社会学研究》第4期。
- 苏熠慧,2021,《从“一元主体”到“多元主体”——“90后”打工女性主体的类型学分析》,《妇女研究论丛》第6期。
- 苏熠慧、倪安妮,2016,《育婴家政工情感劳动的性别化机制分析——以上海CX家政公司为例》,《妇女研究论丛》第5期。
- 孙雅璐,2019,《外来务工青年女性的母职经验研究——以上海市留守儿童母亲和流动儿童母亲为例》,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王娟泰,2012,《家政工城市适应问题研究》,兰州: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吴小英,2018,《性别研究的中国语境——从议题到话语之争》,《妇女研究论丛》第5期。
- 肖索未、简逸伦,2020,《照料劳动与社会不平等——女性主义研究及其启示》,《妇女研究论丛》第5期。
- 肖索未、汤超萍,2021,《流动的母职——乡城迁移中的母职协商》,《妇女研究论丛》第2期。
- 许怡、辛荣,2021,《流动中妇女的母职实践与主体重塑》,《社会发展研究》第4期。
- 严海蓉,2001,《“素质”“自我发展”和阶级的幽灵》,《读书》第3期。
- 杨书,2008,《“消费的城市”与“边缘”的“她们”——转型社会中进城家政女工生存境遇研考》,《贵州社会科学》第7期。
- 余晓敏、潘毅,2008,《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张也,2018,《女性主义交叉性理论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国外理论动态》第7期。
- 周群英,2019,《“家里外人”:家政工身份转换的人类学研究——以阈限理论为视角》,《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 Anagnost, A. 2004, “The Corporeal Politics of Quality (Suzhi).” *Public Culture* 16 (2).
- Bohrer, A. 2018, “Intersectionality and Marxism: A Critical Historiograph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6(2).
- Chen, Y., Tian H. & Chang J. 2021, “Chinese First, Woman Second: Social

- Media and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Female Immigrants.” *Asi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27(1).
- Chen, Z. & Chen L. 2021, “Chinese ‘Female Force’ in An ‘American Factory’: Women’s Identity Formation in An English Reading Club.” *Asi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27(2).
- Clarke, A. & L. McCall 2013, “Intersectionality and Social Explanation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Du Bois Review* 10(2).
- England, P. & N. Folbre 1999, “The Cost of Caring.”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61(1).
- Ferber, M. & J. Nelson 1993, *Beyond Economic Man: Feminist Theory and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erguson, S. 2016, “Intersectionality and Social-Reproduction Feminism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4(6).
- Fu, H., Su Y. & Ni A. 2018, “Selling Motherhood: Gendered Emotional Labor, Citizenly Discounting, and Alienation among China’s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Gender & Society* 32(6).
- Hartsock, N. 1983,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Developing the Ground for A Specifically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S. Harding & M. Hintikka eds., *Discovering Reality*, Dordrecht: Springer.
- Jacka, T. 2009, “Cultivating Citizens: Suzhi (Quality) Discourse in the PRC.”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17(3).
- Kipnis, A. 2007, “Neoliberalism Reified: Suzhi Discourse and Tropes of Neoliber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3(2).
- McCall, L. 2005, “The Complexity of Intersectionality.”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30(3).
- McWhorter, L. 1995, *Bodies and Pleasures: Foucault and the Politics of Sexual Normaliz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Mojab, S. & S. Carpenter 2019, “Marxism, Feminism, and ‘Intersectionality’.” *Journal of Labor and Society* 22(2).

- Murphy, R. 2004, "Turning Peasants into Modern Chinese Citizens: 'Population Quality' Discours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Primary Educ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77.
- Pei, X. & A. Chib 2021, "Beyond the Gender (Dis)Empowerment Dichotomy: The Mobile Phone as Social Catalyst for Gender Transformation in the Global South." *New Media & Society* 23(3).
- Pei, X. 2021, "Reshaping Co-Existence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Polymedia in Gender Identity Negotiation of Dagongmei."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7(13).
- Sigley, G. 2009, "Suzhi, the Body, and the Fortunes of Technoscientific Reason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Positions :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17(3).
- Smith, V. 1998, *Not Just Race, Not Just Gender : Black Feminist Readings*, New York: Routledge.
- Sun, W. 2009, "Suzhi on the Move: Body, Place, and Power." *Positions :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17(3).
- Sun, W. 2014, *Subaltern China : Rural Migrants, Media, and Cultural Practices*,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 Zuboff, S. 2019,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and the Challenge of Collective Action." *New Labor Forum* 28(1).

(责任编辑:邓燕华)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Meaning-Making of Female Domestic Work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Roles of Rural/Urban Divide, Class and Gender in Everyday Life

Chen Zhen, Kuang Xianwen, Liu Xi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roles of rural/urban divide, class and gender in the shaping of Chinese female domestic workers'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meaning-making. With data collected from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semi-structure interviews, it critically analyzes the self-perceptions of female domestic workers' labour experiences as well as their narratives on the everyday life permeating between classes, urban/rural spaces and genders. In particular, it centers on the meaning-making of their work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identity through the lens of intersectionality, which has not been fully applied in current research on this topic. It finds that structural and intersectional social distinctions and inequalities contribute substantially to the "neoliberalization" of female domestic workers' identities. However, this social group also shows their agency in dismantling and even resisting to such inequalities, such as the valorization of their labour beyo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and commodity, and the negotiation against gender inequalities within the household.

Keywords: identity construction; female domestic workers; rural/urban divide; class; gender

Reviews and Research Notes

Causes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 : The Social Origins of State Development*

Yang Duancheng

Reading Notes from Freiburg

Dong Fangjie